

《西南文化创世纪》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西南文化创世纪》

13位ISBN编号：9787532557233

10位ISBN编号：7532557235

出版时间：2010-11

出版社：上海古籍

作者：饶宗颐

页数：269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以及在线试读，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www.tushu000.com

《西南文化创世纪》

前言

四川广汉三星堆的发现，至今正逢十年。这个发现，因内容丰富与奇特，震动了全球考古界，故十年以来有关著述之多、推论之广，皆属少有。但在近代的史学或考古学研究中，每当有一种重要的新材料出现后，必是文章纷飞，宏论左右，要等到说清了若干比较表面的现象后，更因有了新的研究角度或方法，才会出现巨著，把有关的研究推上一个新高峰。选堂先生的《西南文化创世纪——殷代陇蜀部族地理与三星堆、金沙文化》，便是这种巨著。我所以把此书誉之为巨著，首先在于书中提出了一种研究中国古史的新方法——“三重证据法”。上世纪20年代时，由于甲骨文及大量古物的新发现，王国维先生提出了“二重证据法”，主张以历代文献与出土古物互证，把中国三代古史的研究推进到一个新阶段。在时间过去了70多年后，由于大量的考古发现，也由于考古学理论的进步，已大致构筑起了中国的考古学文化谱系的框架，也愈来愈清楚地看清了各考古学文化相互之间的联系与影响。

《西南文化创世纪》

内容概要

三代时期西南古文化分布空间广阔，文化分支众多，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又不断受到其他古文化的影响，文化面貌相当复杂。本书以三星堆的发现为契机，由三星堆遗址推及整个巴蜀，由商代甲骨文结合传世古籍、地方文献，重新审核了甲骨文中有关商代西南地区各部族的地望，深入探讨了商代西南文化、中外交流等重大问题，为殷商时期西南地区的众多部族集团，构筑起了一个新框架或新体系，对中国古史研究来说，更是开辟了一条新途径，登上了一个新高峰。

书籍目录

序

卷一 总论

引言

考证方法举例与地名研究联系性综述

论《牧誓》八国“庸”、“濮”及“羌”之异文

四川出土文物之启示及陇蜀与西南地名

卷二 专论（上）

小臣墙刻辞地理考正

妇好墓石磬之“妊冉”与冉咻

说壳、微与戈——由微、戈地望论舌方的方位

晚殷伐夷方路程宜属西夷地名论

说泚与冒及址戩

说舶与陨氏

卜辞所见西南地名丛考

殷代织方考

唇方、辰卫考——澧县城头山古城遗址初探

武丁时尸方及尸方所属诸地考

三首神考

殷上甲微作淲（滩）考

帝江、工方考

殷代卢帝考

“泽”即漾水、汉水——疋、果、成与岷山道

论卜辞之西戍（越）

卷三 专论（下）

蜀古史年代传说与人皇

白人与焚

鱼国考

氏人半身为鱼的神话与蜀人的太阳崇拜

纵目人传说与瞿方

蜀、廩君、亩土人

宗与鼓、宾

论雷泚与西陵氏之蚕陵及禹出生地的砚石

郁方与古代香药之路

豫方、象郡与象牙、灵龟

川北营盘山五千年遗址与岷山“与子”、朱帝与祝融之关系

殷代黄金及有关问题

跋 甲骨文西南部族地理的新认识——读选堂先生新着《西南文化创世纪》

后记

章节摘录

插图：纣之疆域，《淮南子·泰族训》：左东海，右流沙，前交趾，后幽都，师起容（庸）关，至浦（甫）水，土亿有余万，可能有夸大之辞。文献所记，晚殷田猎所至地方，《史记·殷本纪》云：“武乙猎于河、渭之间，暴雷，武乙震死。”《竹书纪年》：“武乙三十五年，周季历伐西落鬼戎，俘二十翟王。王畋于河、渭，暴雷震死。”又记：“纣四年，大搜于黎。十年六月，畋于西郊。二十二年冬，大搜于渭。”河、渭地区实为晚殷诸王弋猎畋游之所。《御览》八十三引《帝王世纪》“纣七年宫中九市，行炙以百二十日当一夜，六月发民猎于西山”，一作“西土”。终纣之世，未辟狩于东方之纪录。卜辞恒记“某时在某地贞卜”、“步于某地”同版或异版同事所记，其时地有一定联系，可以推求当日活动之史实。董作宾为《帝辛日谱》，考订征人方之行程，即用此一方法，从零星不完整之残片加以扞索联缀，列出线索，虽未必准确，其方法仍大有可取。晚期细字游畋卜辞，见于《英》2562正者，即《合》41768，《金璋》544，原物存于大英博物院，乃由二片缀合，是版细字。

后记

余前年撰《古代香药之路》一文，证明殷卜辞之郁方即在郁林，以出郁金香致贡而得名。《周礼》有“郁人”，司郁金香和鬯酒之专职。汉武改秦桂林郡为郁林，盖用殷人郁方旧名，故其地有郁水。广西贵县罗泊湾汉墓出土有“布山”二字漆杯，证明汉代势力早及其地。马王堆《五十二病方》208，用郁、术、口三物治肪炙伤，时已用郁金为药品。《新修本草》谓郁金主血积，下气生肌止血。1992年，法国远东学院在越南河内举行该院九十周年国际学术会议，余以第一人发言指出香港大湾出土之牙璋与越南之牙璋有密切关系。翌年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因而安排规模宏大之国际牙璋与南中国文化会议，引起考古学界之巨大关注。

《西南文化创世纪》

编辑推荐

《西南文化创世纪:殷代陇蜀部族地理与三星堆、金沙文化》：中国学术丛书

精彩短评

- 1、做先秦的可以看看，其他方向用处不大。
- 2、江湖所谓“北季南饶”之说，即北有季羨林，南有饶宗颐。季氏晚年昏聩，妄语甚多，至于寿长多辱，可复一叹，余不足多论。饶氏居香港，素有大中华情结。其治甲骨卜辞、楚简，多以信古为前提，补正传统中华大一统史观，如以下辞论夏朝之为史实等。此书亦步前趋，考西南古史，志在以汉代之巴蜀西南夷地名人群众尽皆见之于甲骨文。所言愈详，其说恐愈远矣。
- 3、不错，还没看完。期望借助这本书对商代四川、甘南一代的历史建立一个初步映像，目前来看这本书做到了。书中的论述比较严谨，但个人喜欢多图的书籍，如果能配以更多出土文献图像和反映作者推论的地图就更好了。话说回来，本书的读者人群或许主要是专业人士吧，但专业作者们别忘了，你们的书外行也会有兴趣拜读，因此何不在保证专业性的同时写得更生动点呢？
- 4、此书作为一本考证古地名的专业书，实在难懂。本以为是介绍巴蜀古文化的，实际与想象相差太远。不过饶老的学问确实令人佩服。
- 5、名家作品，功力很深。
- 6、维舟兄这篇文章可以投给我们<古籍新书报>
- 7、很多地名考证终究觉得不靠谱。。。。
- 8、每个中国人都在中学课本上学过：180万年前生活在云南的元谋人是中国已知最早的人类，但人们又常常抱有一种牢不可破的历史观，认为中国文明的曙光最早出现在黄河流域（那里也被视为中华民族唯一的摇篮），然后才向四周扩散。在这一图景中，中心的光明之外是黑暗的四周，例如西南诸省，似乎在中原文明抵达之前，那里都是没有历史的。正因此，当1986年三星堆文物出土时，人们在震惊之余大感困惑，这迫使人们对西南的早期历史作全面检讨和重新挖掘。由于史料极端缺乏，考证有时无异于猜谜，一时坊间出现许多“大胆猜想”的读物，有些幻想式考证甚至断言三星堆文明源自两河的苏美尔人。

史迹越是渺茫难寻、无从下手，越是需要扎实的基本功和极强的综合能力，否则仅作无根据的联想毫无价值。王国维曾提出“二重证据法”（文献与出土文物互证），在对西南早期文明的研究中，饶宗颐先生进一步提出了“三重证据法”，主张再加上古代部族活动区域的地望来钩沉古史。就此而言，不仅那段历史堪称“西南文化创世纪”（当然，这里说的西南主要是指四川盆地），对它的研究方法也可说是给中国古史研究中具有创世纪般的意义。不夸张地说，虽然在三星堆、金沙文物出土时，每个人都知道西南的远古史必须要重写了，但恐怕直到本书出版，人们才算知道怎样何才能重写这段历史。

除了总的考证方法之外，本书分为两部分专论：前半主要是释读商代甲骨文来钩稽殷商时代的西南历史，后半则综合运用神话学、民俗学、考古学等材料阐释远古西南的传说、崇拜与对外交通。虽然其中不少材料并不新异，但在不同的视角下，它们却呈现出了不同的意义。例如学界都认为商代甲骨文卜辞中记录有河、洛、淮等中原地区的河流之名，但却没有见到南方长江流域的江、汉两条大河之名。饶先生在此旁征博引，考出甲骨文的“工”即指长江，而“漾”通“洋”，即指汉江。这表明三千多年前生活在中原地带的商人，对南方地理的了解超出了人们原先的料想。

不仅如此，通过对古代一些部族迁移活动在地理上留下的痕迹，并与甲骨文、考古发现相互印证，商代武丁以后西南各部族的地理分布也真正被全面勾画了出来。如古代彭氏部族在今四川彭山县、甘肃彭原县、蜀天彭门等留下的地名痕迹，以此入手，逐渐顺藤摸瓜，复原出商代时该族在四川盆地的大致分布范围。在此之前，正如书中所言，“长期以来，西南的古史活动记载是一片空白，虽有一些扑朔迷离的神话围绕着，事实等于零。”但现在有了这些清晰梳理出来的线索，人们已可证实：西南地区至迟在殷商时代就已经和中原的商文化有了一定程度上的联系，有些部族甚至参与了后来周武王伐纣的战争。

现代考古学已经证实，商时期的巴、蜀文化面貌彼此是非常接近的，而且都受到商文化的很大影响。既然有影响，必然意味着有交流，而交流则意味着两地之间交通往来的事实。四川盆地四周群山

环绕，后人似乎很难设想在三四千年之前的时代，人们竟然能打破地理隔绝，穿行于中原和西南之间。这其中最重要的动力就在于商王朝对玉石的寻求：安阳殷商墓葬中出土的不少玉石是新疆和田玉，而西南的岷山道自古是西域入贡之孔道，这种矿产开采和物品交流的需要遂成为刺激两地文化影响的重要推动力。我们很可能大大低估了古人对外开拓的能力。四川茂县曾出土青铜器及玉石，证明岷江上游远古曾建立国家，而这些器具则明显受到中原影响。李学勤曾说：“自古称蜀道之难，但我们以三星堆的蜀文化与中原的商文化比较，证明两者间交往是畅通的。商文化的影响相当迅速地到达蜀地。”

但西南文化也并非一个被动的受影响者，三星堆文物鲜明独特的个性就是明证。英国学者Jessica Rawson在《中国古代的艺术与文化》中就已注意到，殷商控制地区中，祖先崇拜是宗教祭祀的中心，青铜器常被用为器具；而三星堆却相反，其青铜器主要是偶像。此外，作为南方文化的体现，三星堆文物上的人物形象无论贵贱都是跣足，流行戴脚镯、手镯。西南文化在中国向来别具特色，其根基很可能在远古时代就早已奠定。

饶先生在这里也给出了佐证。通过对《山海经》、《华阳国志》等向来被认为荒诞不经的史料的解读，他从西南地区的神话、崇拜入手，试图复原尚处于文明曙光时期的西南文化。这些记载有一些是相当可贵的史料，反映了西南当时有异于中原的信仰和习惯，如江神被称为帝、头戴恐怖面具以驱吓恶鬼、蛇崇拜与象征复活的鱼图腾、纵目人神话。他肯定了史学家蒙文通的发现：《山海经》中的“中山经”与“海内经”都把四川视为天下之中，前者对巴蜀山川记载得特别详细，所以这部分即便不是出于巴蜀人立场所作，至少作者对于巴蜀史地的知识极丰富。这又进一步证明，远古时代四川盆地与中原已有密切联系。

考古学家苏秉琦在《中国文明起源新探》中曾说，中国早期文明至少可以分为六大区系，其中黄河中游区域与其说是中华民族的摇篮，不如说是起到凝聚作用的熔炉。西南远古史的再发掘有力地佐证了这一观点：殷商时代的中国不仅有多个彼此各具特色、充满活力的文明中心，而且和中原的商王朝之间的互动一直在进行之中。饶先生在《梵学集》等著作中也早已关注到：印度甚至西亚的文化，经过缅甸和西南的通道（所谓“蜀身毒道”）早已渗入到中国古代的文化之中。

这不仅是对西南远古史的重建，还会对人们的历史认识结构产生深远的影响。原本在一些后现代主义的学者看来，西南早期与中原的互动的历史可能是人为虚构的。王明珂在《英雄祖先与弟兄民族》中就认为，正史中将巴蜀视为华夏域内、记载巴蜀在殷商时代就参与华夏政治，这些都只是意在将巴蜀编织进大一统的史观之中，“强调巴蜀在中原之历史大事上并未缺席”。但从现在看来，恐怕未必能认定这些都是后人建构的，相反，那很可能确实是历史事实。

9、看到了西南文化的美与厚重。

10、唇方、辰卫考——澧县城头山古城遗址初探，惊诧了。

11、有客熙来，文明不了

12、买错了，太专业了，看得我直吐血

13、维舟一贯缜密，文气一以贯之。我也长久地不理解三星堆和金沙文化，这书一定要看。

14、具体结论就不要引用太多了吧

15、中国的文明历来是以中原为中心的，从历史的叙述到史迹的存留，再到考古的发现，都在为这个论点增添证据。华夏文明是起源于中原，并向四周辐射扩散，离中原中心越远的地方，似乎离文明也越远，而到边鄙之地，到了华夏的边缘，则进入文明的时代就越晚，文明的程度就越低。这种观点，在中国的学术界，在普通国民的心目中，已成定论。虽说其中有许多不符逻辑或者难以解释之处，我们总是能以种种理由搪塞过去。

不过，随着考古上越来越多新发掘遗址的出现，对于中原中心论已经造成了极大的冲击，由中原中心向四周扩散的观点构成了挑战。特别是四川三星堆遗址及后来的金沙遗址的出现，一种迥异于中原文明的文化呈现于人们的眼前。出土文物的成熟与精美，丝毫不亚于中原出土的文物，年代上也差不多。从传承上来说，很难说三星堆文明来自于中原文明的辐射，实际上更为接近西亚中东一带。这

样问题就来了，像三星堆这样的文明，中原文明是如何辐射的？它又是怎样被中原影响的？作为中原中心论者，除了置之不理，很难给出一个合理的解释。

饶宗颐算是国学大师，博学长寿，研究的范围也颇为广泛，从甲骨文到考古学，从敦煌学到中印关系史，皆是他所长。已是耄耋之年，又利用毕生所学，对一个新的领域进行了研究，写出了《西南文化创世纪——殷代陇蜀部族地理与三星堆、金沙文化》。这是饶宗颐先生的一本论文集，论文大多写于近些年。此次，饶宗颐先生将目光转向了西南，转向了三星堆和金沙，考察显然与主流的中原文明相异质的西南文明（饶先生用的是西南文化）。此书既有对现在研究成果的强调，同时也发了许多前人及时人所未发的观点，厘清了一些一直争论不休的问题。

书分为三卷，第一卷是总论，后两卷为分论。分论上卷是通过甲骨文字句的解读，来考释代码殷商时期西南地区的历史。这一部分让我读得有些似懂非懂，毕竟甲骨文的释字对于我来说，真是很难。而这却正是饶老先生擅长的领域，饶先生号选堂，因而有第五堂之称。在书的前半部分，他围绕着甲骨文中出现的关于地名的字的考证，通过多方的比较与排除，参考了众多的资料，将这些地名确定在四川。饶宗颐先生通过对于地望的研究，对于中华上古文明进行了重新的梳理，明确了西南特别是以三星堆金沙文化为代表的四川文化，在整个中华文明中的地位。

从饶宗颐先生的考评，其实已经是中华文明起源的中原中心论的一个反动，他指出了中华文明的另外一条途径，另外一种起源的可能。除了中原之外，在中国的边陲之地，也同时具有多种的文明兴起，他们相互之间交流影响，共同形成了灿烂的中华文明。书名《西南文化创世纪》，即揭示了这层意思，承认了西南文明也是中华文明的一个起源地，同时又小心翼翼地将文明称为文化。其实，文明与文化究竟有何区别，在学术界还是有争议之事，但在中国的叙事语境之中，文明是大于文化的，在中国只有一个中华文明，其他的都只能是文化，如红山文化、河姆渡文化、良渚文化、三星堆文化等等，都只能是这个大文明下的小构件。饶先生发现了三星堆为代表的西南文明的重要性，但仍然无法走出中原中心论。

三星堆及金沙出土的文物，我曾多次观看，也给我很大的震撼。很明显，这是一种与中原文明异质的文明，与我们过去常见的中原出土的文物，有着相当大的差异。两者之间当然也有相似之处，也存在着交流，但绝非以往我们所认为的那样，是中原文明向外辐射影响，恐怕方向应该反过来。中原文明只是文明传播的末端，而三星堆也非起源点，它的文明来自于远方。我也曾看过云南出土的青铜器，虽然年代不是很早，但亦迥异于中原，显得更加精致。中原不产铜锡，云南则从古到今都是这两种金属的产地。现在已有专家证明，中原许多青铜器里的铜来自于云南。如果说一个不产原料的地方，青铜器的起源比原料产地要更早，这在逻辑上存在着很大的问题。

如果我们换个思路看待这个问题，可能就会有逻辑得多。从云南，到四川，再到中原，这是一条非常清晰的路线，也就是文明传播的路线图。中华文明究竟是原生于此地，还是外来的，在学术界也是争论不休。但我们可以这样说，中华文明与世界其他文明有着太多的相似性，因此不可能是独立发展出来的，与其他文明肯定在早期有过交流。交流的途径，以前我们只承认西北一途，现在越来越多的考古证据也证明了这一途径的存在。但我们忽略了另外一条路径，即西南这条途径，也就是人们所称的南方丝绸之路。我们以前也认可这么一条路径，只是将年代大大地推后了。从现有的考古成果来说，这条路径在远古时就已存在，且非常的繁荣。来自两河流域的文明，经过印度，进入中国。从云南，再到四川，最后到达中原。中原已是欧亚大陆的终端，两河流域文明经过两条路径，最后交汇于中原，最后形成了灿烂的中华文明。

当然，这些并非饶宗颐先生在书中的观点，只是我的猜想而已。饶先生在书中对于甲骨文中许多字的考释，却证明了西南文明远古时的繁荣景象。同时，我们也可以想像，在未来不久，还会有更多如三星堆一样的考古发现，来证明这一点。

16、中国的文明历来是以中原为中心的，从历史的叙述到史迹的存留，再到考古的发现，都在为这个论点增添证据。华夏文明是起源于中原，并向四周辐射扩散，离中原中心越远的地方，似乎离文明也

越远，而到边鄙之地，到了华夏的边缘，则进入文明的时代就越晚，文明的程度就越低。这种观点，在中国的学术界，在普通国民的心目中，已成定论。虽说其中有许多不符逻辑或者难以解释之处，我们总是能以种种理由搪塞过去。不过，随着考古上越来越多新发掘遗址的出现，对于中原中心论已经造成了极大的冲击，由中原中心向四周扩散的观点构成了挑战。特别是四川三星堆遗址及后来的金沙遗址的出现，一种迥异于中原文明的文化呈现于人们的眼前。出土文物的成熟与精美，丝毫不亚于中原出土的文物，年代上也差不多。从传承上来说，很难说三星堆文明来自于中原文明的辐射，实际上更为接近西亚中东一带。这样问题就来了，像三星堆这样的文明，中原文明是如何辐射的？它又是怎样被中原影响的？作为中原中心论者，除了置之不理，很难给出一个合理的解释。饶宗颐算是国学大师，博学长寿，研究的范围也颇为广泛，从甲骨文到考古学，从敦煌学到中印关系史，皆是他所长。已是耄耋之年，又利用毕生所学，对一个新的领域进行了研究，写出了《西南文化创世纪——殷代陇蜀部族地理与三星堆、金沙文化》。这是饶宗颐先生的一本论文集，论文大多写于近些年。此次，饶宗颐先生将目光转向了西南，转向了三星堆和金沙，考察显然与主流的中原文明相异质的西南文明（饶先生用的是西南文化）。此书既有对现在研究成果的强调，同时也发了许多前人及时人所未发的观点，厘清了一些一直争论不休的问题。书分为三卷，第一卷是总论，后两卷为分论。分论上卷是通过甲骨文字句的解读，来考释代码殷商时期西南地区的历史。这一部分让我读得有些似懂非懂，毕竟甲骨文的释字对于我来说，真是很难。而这却正是饶老先生擅长的领域，饶先生号选堂，因而有第五堂之称。在书的前半部分，他围绕着甲骨文中出现的关于地名的字的考证，通过多方的比较与排除，参考了众多的资料，将这些地名确定在四川。饶宗颐先生通过对于地望的研究，对于中华上古文明进行了重新的梳理，明确了西南特别是以三星堆金沙文化为代表的四川文化，在整个中华文明中的地位。从饶宗颐先生的考评，其实已经是中华文明起源的中原中心论的一个反动，他指出了中华文明的另外一条途径，另外一种起源的可能。除了中原之外，在中国的边陲之地，也同时具有多种的文明兴起，他们相互之间交流影响，共同形成了灿烂的中华文明。书名《西南文化创世纪》，即揭示了这层意思，承认了西南文明也是中华文明的一个起源地，同时又小心翼翼地将文明称为文化。其实，文明与文化究竟有何区别，在学术界还是有争议之事，但在中国的叙事语境之中，文明是大于文化的，在中国只有一个中华文明，其他的都只能是文化，如红山文化、河姆渡文化、良渚文化、三星堆文化等等，都只能是这个大文明下的小构件。饶先生发现了三星堆为代表的西南文明的重要性，但仍然无法走出中原中心论。三星堆及金沙出土的文物，我曾多次观看，也给我很大的震撼。很明显，这是一种与中原文明异质的文明，与我们过去常见的中原出土的文物，有着相当大的差异。两者之间当然也有相似之处，也存在着交流，但绝非以往我们所认为的那样，是中原文明向外辐射影响，恐怕方向应该反过来。中原文明只是文明传播的末端，而三星堆也非起源点，它的文明来自于远方。我也曾看过云南出土的青铜器，虽然年代不是很早，但亦迥异于中原，显得更加精致。中原不产铜锡，云南则从古到今都是这两种金属的产地。现在已有专家证明，中原许多青铜器里的铜来自于云南。如果说一个不产原料的地方，青铜器的起源比原料产地要更早，这在逻辑上存在着很大的问题。如果我们换个思路看待这个问题，可能就会有逻辑得多。从云南，到四川，再到中原，这是一条非常清晰的路线，也就是文明传播的路线图。中华文明究竟是原生于此地，还是外来的，在学术界也是争论不休。但我们可以这样说，中华文明与世界其他文明有着太多的相似性，因此不可能是独立发展出来的，与其他文明肯定在早期有过交流。交流的途径，以前我们只承认西北一途，现在越来越多的考古证据也证明了这一途径的存在。但我们忽略了另外一条路径，即西南这条途径，也就是人们所称的南方丝绸之路。我们以前也认可这么一条路径，只是将年代大大地推后了。从现有的考古成果来说，这条路径在远古时就已存在，且非常的繁荣。来自两河流域的文明，经过印度，进入中国。从云南，再到四川，最后到达中原。中原已是欧亚大陆的终端，两河流域文明经过两条路径，最后交汇于中原，最后形成了灿烂的中华文明。当然，这些并非饶宗颐先生在书中的观点，只是我的猜想而已。饶先生在书中对于甲骨文中许多字的考释，却证明了西南文明远古时的繁荣景象。同时，我们也可以想像，在未来不久，还会有更多如三星堆一样的考古发现，来证明这一点。阅读更多 ’

17、前半主要是释读商代甲骨文来钩稽殷商时代的西南历史，后半则综合运用神话学、民俗学、考古学等材料阐释远古西南的传说、崇拜与对外交通。在不同的视角下，它们却呈现出了不同的意义。学界都认为商代甲骨文卜辞中记录有河、洛、淮等中原地区的河流之名，但却没有见到南方长江流域的江、汉两条大河之名。饶先生在此旁征博引，考出甲骨文的“工”即指长江，而“漾”通“洋”，即指汉江。这表明三千多年前生活在中原地带的商人，对南方地理的了解超出了人们原先的料想。通过

《西南文化创世纪》

对古代一些部族迁移活动在地理上留下的痕迹，并与甲骨文、考古发现相互印证，商代武丁以后西南各部族的地理分布也真正被全面勾画了出来。如古代彭氏部族在今四川彭山县、甘肃彭原县、蜀天彭门等留下的地名痕迹，以此入手逐渐顺藤摸瓜，复原出商代时该族在四川盆地的大致分布范围。

18、不要评价了。大师。

19、文笔不及早年流畅

20、谢谢楼上，我已在卓越下单买了一本，恰好家里只有《中国边疆民族研究》前两辑。

21、认识先秦，开启中华文化之旅！

22、大视野下的研究。

23、不怀疑作者的古文修为，然而脑洞太大，不少推论拿来当作小说素材倒是不错。噫，今之中国多美利坚器物，知中国必已控制美利坚朝贡国，今之中国宗教神话与印度欧洲同者，恐是中国文化辐射四海所致。

24、饶老涉猎很广，对新课题反应很快，可谓学之时者！但要论到深入性，仍有很大空间可以拓展。

25、我也是这样猜想的，而且这也符合人类迁徙路线。不过，文明传播路线的末端应在美洲。只是政治或民众不像学术界，可以为学术而学术，而且学术界自己有时也受制于习惯思维，比如无法走出中原中心论等。此外某些“研究成果”也是被授意的。

至今不还有很多人试图相信不仅中华文明，甚至连中华的人类都是独立起源的吗。然而，当对各个文明有了了解后，自己就能发现这一条路径上相互接壤的文明之间的传承关系吧。

26、很喜欢。推荐。

27、门槛太高，主要翻了翻序和跋

28、很有启发价值的一本学术文集，不过图录有点少

29、用心做学问的人出的书那才叫真正的书。值得一读，对于静心要了解知识的人来说。

30、关于王明珂的研究方法和思路，推荐一篇书评：钟焄《历史学研究的人类学化及其存在的问题——评王明珂 游牧者的抉择：面对汉帝国的北亚游牧部族》，《中国边疆民族研究》第3辑，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242-265页。

1、中国的文明历来是以中原为中心的，从历史的叙述到史迹的存留，再到考古的发现，都在为这个论点增添证据。华夏文明是起源于中原，并向四周辐射扩散，离中原中心越远的地方，似乎离文明也越远，而到边鄙之地，到了华夏的边缘，则进入文明的时代就越晚，文明的程度就越低。这种观点，在中国的学术界，在普通国民的心目中，已成定论。虽说其中有许多不符逻辑或者难以解释之处，我们总是能以种种理由搪塞过去。不过，随着考古上越来越多新发掘遗址的出现，对于中原中心论已经造成了极大的冲击，由中原中心向四周扩散的观点构成了挑战。特别是四川三星堆遗址及后来的金沙遗址的出现，一种迥异于中原文明的文化呈现于人们的眼前。出土文物的成熟与精美，丝毫不亚于中原出土的文物，年代上也差不多。从传承上来说，很难说三星堆文明来自于中原文明的辐射，实际上更为接近西亚中东一带。这样问题就来了，像三星堆这样的文明，中原文明是如何辐射的？它又是怎样被中原影响的？作为中原中心论者，除了置之不理，很难给出一个合理的解释。饶宗颐算是国学大师，博学长寿，研究的范围也颇为广泛，从甲骨文到考古学，从敦煌学到中印关系史，皆是他所长。已是耄耋之年，又利用毕生所学，对一个新的领域进行了研究，写出了《西南文化创世纪——殷代陇蜀部族地理与三星堆、金沙文化》。这是饶宗颐先生的一本论文集，论文大多写于近些年。此次，饶宗颐先生将目光转向了西南，转向了三星堆和金沙，考察显然与主流的中原文明相异质的西南文明（饶先生用的是西南文化）。此书既有对现在研究成果的强调，同时也发了许多前人及时人所未发的观点，厘清了一些一直争论不休的问题。书分为三卷，第一卷是总论，后两卷为分论。分论上卷是通过甲骨文字句的解读，来考释代码殷商时期西南地区的历史。这一部分让我读得有些似懂非懂，毕竟甲骨文的释字对于我来说，真是很难。而这却正是饶老先生擅长的领域，饶先生号选堂，因而有第五堂之称。在书的前半部分，他围绕着甲骨文中出现的关于地名的字的考证，通过多方的比较与排除，参考了众多的资料，将这些地名确定在四川。饶宗颐先生通过对于地望的研究，对于中华上古文明进行了重新的梳理，明确了西南特别是以三星堆金沙文化为代表的四川文化，在整个中华文明中的地位。从饶宗颐先生的考评，其实已经是中华文明起源的中原中心论的一个反动，他指出了中华文明的另外一条途径，另外一种起源的可能。除了中原之外，在中国的边陲之地，也同时具有多种的文明兴起，他们相互之间交流影响，共同形成了灿烂的中华文明。书名《西南文化创世纪》，即揭示了这层意思，承认了西南文明也是中华文明的一个起源地，同时又小心翼翼地将文明称为文化。其实，文明与文化究竟有何区别，在学术界还是有争议之事，但在中国的叙事语境之中，文明是大于文化的，在中国只有一个中华文明，其他的都只能是文化，如红山文化、河姆渡文化、良渚文化、三星堆文化等等，都只能是这个大文明下的小构件。饶先生发现了三星堆为代表的西南文明的重要性，但仍然无法走出中原中心论。三星堆及金沙出土的文物，我曾多次观看，也给我很大的震撼。很明显，这是一种与中原文明异质的文明，与我们过去常见的中原出土的文物，有着相当大的差异。两者之间当然也有相似之处，也存在着交流，但绝非以往我们所认为的那样，是中原文明向外辐射影响，恐怕方向应该反过来。中原文明只是文明传播的末端，而三星堆也非起源点，它的文明来自于远方。我也曾看过云南出土的青铜器，虽然年代不是很早，但亦迥异于中原，显得更加精致。中原不产铜锡，云南则从古到今都是这两种金属的产地。现在已有专家证明，中原许多青铜器里的铜来自于云南。如果说一个不产原料的地方，青铜器的起源比原料产地要更早，这在逻辑上存在着很大的问题。如果我们换个思路看待这个问题，可能就会有逻辑得多。从云南，到四川，再到中原，这是一条非常清晰的路线，也就是文明传播的路线图。中华文明究竟是原生于此地，还是外来的，在学术界也是争论不休。但我们可以这样说，中华文明与世界其他文明有着太多的相似性，因此不可能是独立发展出来的，与其他文明肯定在早期有过交流。交流的途径，以前我们只承认西北一途，现在越来越多的考古证据也证明了这一途径的存在。但我们忽略了另外一条路径，即西南这条途径，也就是人们所称的南方丝绸之路。我们以前也认可这么一条路径，只是将年代大大地推后了。从现有的考古成果来说，这条路径在远古时就已存在，且非常的繁荣。来自两河流域的文明，经过印度，进入中国。从云南，再到四川，最后到达中原。中原已是欧亚大陆的终端，两河流域文明经过两条路径，最后交汇于中原，最后形成了灿烂的中华文明。当然，这些并非饶宗颐先生在书中的观点，只是我的猜想而已。饶先生在书中对于甲骨文中许多字的考释，却证明了西南文明远古时的繁荣景象。同时，我们也可以想像，在未来不久，还会有更多如三星堆一样的考古发现，来证明这一点。

2、每个中国人都在中学课本上学过：180万年前生活在云南的元谋人是中国已知最早的人类，但人们

又常常抱有一种牢不可破的历史观，认为中国文明的曙光最早出现在黄河流域（那里也被视为中华民族唯一的摇篮），然后才向四周扩散。在这一图景中，中心的光明之外是黑暗的四周，例如西南诸省，似乎在中原文明抵达之前，那里都是没有历史的。正因此，当1986年三星堆文物出土时，人们在震惊之余大感困惑，这迫使人们对西南的早期历史作全面检讨和重新挖掘。由于史料极端缺乏，考证有时无异于猜谜，一时坊间出现许多“大胆猜想”的读物，有些幻想式考证甚至断言三星堆文明源自两河的苏美尔人。史迹越是渺茫难寻、无从下手，越是需要扎实的基本功和极强的综合能力，否则仅作无根据的联想毫无价值。王国维曾提出“二重证据法”（文献与出土文物互证），在对西南早期文明的研究中，饶宗颐先生进一步提出了“三重证据法”，主张再加上古代部族活动区域的地望来钩沉古史。就此而言，不仅那段历史堪称“西南文化创世纪”（当然，这里说的西南主要是指四川盆地），对它的研究方法也可说是给中国古史研究中具有创世纪般的意义。不夸张地说，虽然在三星堆、金沙文物出土时，每个人都知道西南的远古史必须要重写了，但恐怕直到本书出版，人们才算知道怎样如何才能重写这段历史。除了总的考证方法之外，本书分为两部分专论：前半主要是释读商代甲骨文来钩稽殷商时代的西南历史，后半则综合运用神话学、民俗学、考古学等材料阐释远古西南的传说、崇拜与对外交通。虽然其中不少材料并不新异，但在不同的视角下，它们却呈现出了不同的意义。例如学界都认为商代甲骨文卜辞中记录有河、洛、淮等中原地区的河流之名，但却没有见到南方长江流域的江、汉两条大河之名。饶先生在此旁征博引，考出甲骨文的“工”即指长江，而“漾”通“洋”，即指汉江。这表明三千多年前生活在中原地带的商人，对南方地理的了解超出了人们原先的料想。不仅如此，通过对古代一些部族迁移活动在地理上留下的痕迹，并与甲骨文、考古发现相互印证，商代武丁以后西南各部族的地理分布也真正被全面勾画了出来。如古代彭氏部族在今四川彭山县、甘肃彭原县、蜀天彭门等留下的地名痕迹，以此入手，逐渐顺藤摸瓜，复原出商代时该族在四川盆地的大致分布范围。在此之前，正如书中所言，“长期以来，西南的古史活动记载是一片空白，虽有一些扑朔迷离的神话围绕着，事实等于零。”但现在有了这些清晰梳理出来的线索，人们已可证实：西南地区至迟在殷商时代就已经和中原的商文化有了一定程度上的联系，有些部族甚至参与了后来周武王伐纣的战争。现代考古学已经证实，商时期的巴、蜀文化面貌彼此是非常接近的，而且都受到商文化的很大影响。既然有影响，必然意味着有交流，而交流则意味着两地之间交通往来的事实。四川盆地四周群山环绕，后人似乎很难设想在三四千年之前的时代，人们竟然能打破地理隔绝，穿行于中原和西南之间。这其中最重要的动力就在于商王朝对玉石的寻求：安阳殷商墓葬中出土的不少玉石是新疆和田玉，而西南的岷山道自古是西域入贡之孔道，这种矿产开采和物品交流的需要遂成为刺激两地文化影响的重要推动力。我们很可能大大低估了古人对外开拓的能力。四川茂县曾出土青铜器及玉石，证明岷江上游远古曾建立国家，而这些器具则明显受到中原影响。李学勤曾说：“自古称蜀道之难，但我们以三星堆的蜀文化与中原的商文化比较，证明两者间交往是畅通的。商文化的影响相当迅速地到达蜀地。”但西南文化也并非一个被动的受影响者，三星堆文物鲜明独特的个性就是明证。英国学者Jessica Rawson在《中国古代的艺术与文化》中就已注意到，殷商控制地区中，祖先崇拜是宗教祭祀的中心，青铜器常被用为器具；而三星堆却相反，其青铜器主要是偶像。此外，作为南方文化的体现，三星堆文物上的人物形象无论贵贱都是跣足，流行戴脚镯、手镯。西南文化在中国向来别具特色，其根基很可能在远古时代就早已奠定。饶先生在这里也给出了佐证。通过对《山海经》、《华阳国志》等向来被认为荒诞不经的史料的解读，他从西南地区的神话、崇拜入手，试图复原尚处于文明曙光时期的西南文化。这些记载有一些是相当可贵的史料，反映了西南当时有异于中原的信仰和习惯，如江神被称为帝、头戴恐怖面具以驱吓恶鬼、蛇崇拜与象征复活的鱼图腾、纵目人神话。他肯定了史学家蒙文通的发现：《山海经》中的“中山经”与“海内经”都把四川视为天下之中，前者对巴蜀山川记载得特别详细，所以这部分即便不是出于巴蜀人立场所作，至少作者对于巴蜀史地的知识极丰富。这又进一步证明，远古时代四川盆地与中原已有密切联系。考古学家苏秉琦在《中国文明起源新探》中曾说，中国早期文明至少可以分为六大区系，其中黄河中游区域与其说是中华民族的摇篮，不如说是起到凝聚作用的熔炉。西南远古史的再发掘有力地佐证了这一观点：殷商时代的中国不仅有多个彼此各具特色、充满活力的文明中心，而且和中原的商王朝之间的互动一直在进行之中。饶先生在《梵学集》等著作中也早已关注到：印度甚至西亚的文化，经过缅甸和西南的通道（所谓“蜀身毒道”）早已渗入到中国古代的文化之中。这不仅是对西南远古史的重建，还会对人们的历史认识结构产生深远的影响。原本在一些后现代主义的学者看来，西南早期与中原的互动的历史可能是人为虚构的。王明珂在《英雄祖先与弟兄民族》中就认为，正史中将巴蜀视为华夏域内、记载巴蜀在殷商时代就参与

《西南文化创世纪》

华夏政治，这些都只是意在将巴蜀编织进大一统的史观之中，“强调巴蜀在中原之历史大事上并未缺席”。但从现在看来，恐怕未必能认定这些都是后人建构的，相反，那很可能确实是历史事实。

《西南文化创世纪》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www.tushu000.com